

大家读书

怎样把书读活

——谈谈毛泽东的读书方法

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毛泽东就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

1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了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种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收获。

2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看,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3 相同主题的书,要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另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4 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译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读“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写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在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年底他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5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联络员”

读书要当“联络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络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

所谓“联络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

“联络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6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

这也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陶鲁笏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观点。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很重要的”。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章,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史·伯提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唐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历史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习近平同志号召“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八个本领”,其中第一个本领就是“增强学习本领”。善读书,就是一种学习本领。毛泽东善于把书读活,对我们增强学习的本领,不无启发。(据《人民日报》作者:陈晋)

书界动态

冯骥才“重返文坛”: 《单筒望远镜》 再续“怪世奇谈”

冯骥才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近15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作家沉淀近30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书写了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

小说背景依然立足于冯骥才最熟悉的天津,讲述了20世纪初期一段跨文化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浪漫的传奇,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悲剧。

冯骥才说:“在历史上,天津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条件得天独厚。”

小说起源于他对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可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此窥探,却又充满距离感。

在20世纪80年代,冯骥才是整个新时期文学发展变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他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文化遗产保护,虽然搁置了小说创作,但加深了对历史文化反思。

“20多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冯骥才说。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30年的沉淀,使这部作品呈现出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厚重面貌,把对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人性的国民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

此外,书中插入了冯骥才为这部小说搜集了几十年的反映当时历史图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镜像,为小说中的时代做了全景式注解。(据新华社)

他山之石

安徽合肥: 小人书“重版”受热捧

看小人书是许多“70后”“80后”美好的童年回忆,元旦假期前,安徽合肥三孝口新华书店特地设置了“小人书专柜”,将100多套经典的小人书陈列出来,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阅读、购买。

这些小人书大多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有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说、战争年代的故事以及一些经典的童话、神话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带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不少中年人前来购买收藏。

“这些作品主要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出版的,有的是珍贵的重版作品,也有重新编辑出版的作品。”新华书店管理人员介绍,元旦假期开始之后,小人书更加热销,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阅读,小朋友们也非常喜欢,预计进入寒假之后销量还会增加,书店方面已经开始补货、备货。(据新华社)

好书推介



《唐诗求是》

★作者 陈尚君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在重编《全唐诗》及其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获。作者心慕前贤,融会文史,在诗人生平、作品真伪、文本还原、事实阐述等方面,大大突破明清汇选唐诗的局限。本书所收篇章论有据,考订精审,无论是对唐代诗歌的个案研究,还是对一代文学史的考察,都有发覆启蒙之意义。



《科幻之书》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该书一套4册,精选了包括刘慈欣、韩松、克拉克、阿西莫夫等在内的100位世界科幻名家的100篇经典短篇小说,作品时间跨度超过100年,收录了从科幻小说诞生之初到最近的杰作,其中不少篇目是首次在中国出版。